

长征与文化

◎李安葆 著



倒在张国焘屠刀下的红色戏剧家——胡底在长征中

马背上的书法家——舒同在长征中

不畏艰难 不辱使命——潘汉年与长征

带着德文版《共产党宣言》长征——成仿吾在长征中

奋发踔厉的宣传工作风范——邓小平在长征中

长征诗歌的巍峨高峰——毛泽东的长征诗词

长征事迹的国际传播

长征日记漫议

长征与诗歌

长征文化概述

党建读物出版社

长征与文化

◎李安葆 著



党建读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征与文化 / 李安葆著. —北京 :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2.1

ISBN 7-80098-508-3

I . 长... II . 李... III . 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1936)
-文化·研究 IV . K264.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3232 号

责任编辑:徐 衍 封面设计:彩 林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万寿路西街甲 7 号 邮编:100036 电话:010-68219430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科技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244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0098-508-3/D·388 定价:27.00 元

本社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电话:010-68278452)

封面:《艰难的岁月》(雕塑)

作者:潘鹤

目 录

长征文化概述	(1)
长征与诗歌	(38)
长征与音乐	(49)
长征与美术	(58)
长征与戏剧	(66)
长征与舞蹈	(74)
长征与体育	(79)
长征与宗教	(84)
长征日记漫议	(106)
长征途中红军的文化学习生活	(127)
长征与一二·九运动	(132)
长征事迹的国际传播	(143)
长征诗歌的巍峨高峰	
——毛泽东的长征诗词	(157)
奋发踔厉的宣传工作风范	
——邓小平在长征中	(171)
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的先驱	
——陈云与长征	(180)
维护文物功,当不在禹下	
——徐特立在长征中	(189)

长征不疲伴同人	
——林伯渠的长征诗歌	(194)
革命如斯道路长	
——谢觉哉的长征诗歌	(201)
长征之歌响三军	
——陆定一在长征中	(205)
带着德文版《共产党宣言》长征	
——成仿吾在长征中	(210)
热情做宣传 丹心写长征	
——冯雪峰与长征	(215)
不畏艰难 不辱使命	
——潘汉年与长征	(222)
缠索戴枷行万里	
——廖承志在长征中	(227)
创作长征艺术的精品	
——黄镇在长征中	(235)
一路歌舞伴长征	
——李伯钊在长征中	(241)
马背上的书法家	
——舒同在长征中	(247)
红色艺术家 血染长征路	
——钱壮飞在长征中	(252)
倒在张国焘屠刀下的红色戏剧家	
——胡底在长征中	(256)
进军的鼓角	
——彭加伦在长征中	(260)
大渡河边吟古今	
——李一氓在长征中	(266)

途经万水观天地 漫步千山看日星	
——魏传统的长征诗歌 (270)
桥前火把又纵横	
——郭化若的长征诗歌 (280)
含辛茹苦 不懈奋斗	
——危拱之在长征中 (287)
红旗万杆风飘	
——李真的长征诗词 (294)
永葆长征这股劲	
——陈靖的长征诗歌 (302)

长征文化概述

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仅建树了中国革命史上的巍峨丰碑，而且构建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奇丽景观。红军长征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以汉文化为基本特色，充盈着生机魅力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革命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章。今天，我们研究长征文化，不仅是研究红军长征史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对继承长征文化的优良传统，弘扬长征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所阐述和研究的长征时期红军文化的基本内涵，包括长征时期的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新闻出版、文化教育、卫生和体育活动，同时研究长征时期红军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和沟通。最后，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探讨长征文化的基本价值观。

一、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

毛泽东指出，“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① 它是为革命斗争服务的。长征文艺是为红军的战略转移服务的，它对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红军长征的胜利进军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长征文艺包括长征诗歌、戏剧、舞蹈、音乐、美术等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它是长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长征文化,我们首先要研究红军的长征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活动。

长征时期,红军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活动主要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从事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活动人员成分的多元化。

长征文化工作人员的多元化,体现在从事文艺创作和宣传活动的人员当中,既有专业工作者,又有业余人员。这一时期红军的专业文艺团体不多,红一方面军有红一军团的战士剧社,红三军团的火线剧社,红五军团的猛进剧社,其中以战士剧社最为著名。红二方面军有战斗剧社,红四方面军有总政剧团,红二十五军也有自己的宣传队,1935年冬成立了火星剧社。

这些色彩纷呈的文艺团体,在长征途中采取的活动形式不尽相同。在红一方面军,各剧社是各部队宣传队的艺名,在长征期间多以宣传队的形式活动。宣传队曾分为3个分队:演讲分队(负责宣传组织群众),艺术分队(负责编排小节目、化装宣传),张贴分队(负责写标语、散发布告传单)。这些宣传队成为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的主要角色,从事演剧、唱歌、跳舞、说快板、口头宣传、张贴标语等活动。宣传队一般人数不多,短小精悍,适合行军途中的灵活机动。最能体现宣传队作用的是设立宣传鼓动棚,即在部队经过的路边搭起棚子,插上一面红旗,宣传员站在路边唱歌,数快板,呼口号,鼓舞部队前进。设立鼓动棚大多是在情况紧急、环境艰困或在部队行军比较疲劳的情况下采用的。根据一些同志回忆,长征路上红一方面军设立大的宣传鼓动棚至少有四次:第一次是在湘江边上,第二次是在乌江之畔,第三次是在金沙江边,第四次是在过雪山之时。比较小的宣传、鼓动活动和文艺表演就更多了。相比之下,以剧社形式进行的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活动就少一些,这

是因为在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和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各剧社很难有充裕的时间开展大型正规的文艺活动,只能在遇到大的节日,如五一节、八一节和两军大会师等情况时,各剧社的成员才集中组织起来,进行一些较大规模的演出活动,其他时间各剧社则以宣传队形式分散活动。

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也主要以宣传队的形式进行文艺活动。战斗剧社是红二方面军在1936年7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由贺龙提议成立的。该剧社曾在红四方面军总政剧团的指导下接受培训,因当时正准备过草地,所以活动并不多。它到达陕北接受中央人民剧社的培训后,活动才频繁起来。红二十五军在长征时期还没有成立专业文艺团体,只有小型宣传队开展文化宣传活动。

在几支红军队伍中,只有红四方面军的文艺宣传活动较多地采用了剧社的形式。该军剧社原称工农剧团,长征中改称总政剧团(由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领导),后又改称为前进剧社,是长征红军部队中规模较大的一个文艺团体。该剧团设有导演股、扮演股、布景股、音乐股(三军会师后,增设戏剧股、跳舞股、化妆股、道具股等)。这个剧团在长征途中较为活跃,演出活动也较多。

所有这些专业文艺团体的活动,构成了长征时期红军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而与此同时,广大非专业人员对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活动的积极参与,又构成了这一时期红军文化生活的另一特色。当时广大红军战士和一般干部最常见的文艺活动是写诗、对歌。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编打油诗、快板诗或编民歌小调,现编现凑,少则十几分钟、几十分钟,多则半天,作品就能同读者或观众见面了。这些作品,是“红军心声的扩大,红军感情的抒发,最富于鼓动性、战斗性、及时性”。^① 而对歌则是广大红军战士喜闻乐见的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文艺活动形式。“在行军途中的‘娱乐会’上，或三五个要好的朋友之间，利用民歌民谣的曲调即兴编唱，起到娱乐作用。编唱这种歌儿，出身在南方的青少年，特别是湘西、黔东和赣南的人最得心应手不过，只需要很短时间，一连串新编歌词就‘装进’现成的曲子里”。^① 在对歌时，战士们一般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运用耳熟能详的戏曲、民歌等艺术形式，进行二度创作，带有明显的地方性。歌曲开头有一些固定的格式，比如：“江西老表同志哥，请你过来应山歌，今天行军没得事，恭恭敬敬向你学”，“不打鼓来不敲锣，都坐下来凑山歌，一班开头领个先，二班三班紧接着”。以下的内容就可以任意接唱，如“走了一山又一山，湘北一拐到四川，才在贵州歇个脚，眼睛一眨到云南！”“谁家伢子在夸口，高山当作平路走，前面这座大雪山，爬到顶头再吹牛。”……

在长征队伍中，从事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活动的业余人员里还有一些红军高级干部。由于党一直把文艺宣传工作当作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因此红军在建立之初，很快就形成了领导干部参加文艺演出活动的风气。如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等曾在《庐山之雪》、《杀上庐山》等话剧中担任不同的角色。此外，他们还经常参加话剧剧本的创作。在长征途中，由于军事任务紧急繁忙，红军高级干部对文艺创作和宣传活动的参与相对减少，但这种习惯却一直保留着。

长征这一特殊的环境，使红军的文艺创作和宣传活动出现了新的气象。从事文艺宣传活动人员的广泛性和群体化这一特征，并不是自长征开始才有的，但却是在长征时期得到进一步强化的。与长征前后各个阶段相比，红军这一时期在自然和人为两个方面都遇到极大的困难，征途中战斗频繁，生活极端艰苦、单调，使人容易产生疲惫、苦闷的情绪。严酷的现实环境决定了红军政治部门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加倍重视文艺宣传工作的作用。红军宣传队和各个剧社的积极活动,活跃了红军指战员的军旅文化生活,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克服了行军作战时的紧张、单调和苦闷的生活情绪。红军战士对文艺活动的积极参与,念几句顺口溜,唱一首山歌,说一段快板,起到了自娱娱人、寓教于乐的积极作用,这是红军长征文艺活动的奇特功效。

当然,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从事文艺活动成员的多元化,同时反映了红军文艺工作初创阶段的不够成熟。由于这一时期从事文艺创作和演出活动的专门人才相对缺乏,广大红军指战员、机关干部便成了红军文艺工作的重要成员。他们的“非职业化”,不能不对这一时期的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活动的质量产生一定影响。

长征时期红军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活动的第二个特点是,文艺创作和宣传工作与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紧密关联,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在长征时期,军事斗争是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问题。因此,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中,反映军事斗争题材的占了很大比重。环境越是险恶,斗争越是艰苦,红军的文艺活动也越频繁,越红火。红军在抢渡金沙江、大渡河、翻越雪山、草地时,都留下了许多文艺作品。例如,当中央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奔袭金沙江皎平渡之际,红军宣传干部彭加伦便创作了《渡金沙江胜利歌》:“金沙江流水哗啦啦响,常胜的红军来渡江,不怕它水深河流急,更不怕山高路又长。我们真顽强,战胜了困难,克服一切疲劳,下决心我们要渡江。”据回忆,“当时渡江,后有顽敌,前有险阻,大家唱着这支歌,斗志昂扬,战胜了疲劳和困难”。^①渡江之后,为了庆祝胜利,宣传党和红军指战员的智慧和英勇顽强,红军干部黄镇又编写、演出了独幕话剧《破草鞋》,讲述红军巧渡金沙江,当国民党军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赶到江边时，什么也没捞到，只捡到红军丢下的破草鞋而已。这出戏嘲笑了国民党军队的无能，演出效果很好。

再如，红军在攀越高耸入云、白雪皑皑的夹金山时，红军宣传干部创作了《翻夹金山歌》。为鼓动战士们勇攀雪山，红军宣传队在半山腰便说起了快板：“翻山顶，看本领，比比哪个是英雄……”。而江西籍的红军战士，则唱起了《大雾围山山重山》的兴国山歌。当红军艰难跋涉在茫茫无边、水草丛生的大草地时，红军宣传队员便说起快板：“同志哥，听我说，前面还有十里多，过了十里就宿营，支上铜锅煮青稞”……。红军电台通讯员罗常明创作的快板诗《草地》，更是活泼欢快，妙趣横生。

从上可见，红军长征时期的文艺创作和宣传活动都紧紧围绕着当时的军事行动，是为当时军事斗争的实际需要服务的。同时还应指出，当一些红军高级干部参与文艺创作或演出活动时，总是自觉地把当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其中，使之更好地为现实政治、军事斗争服务。他们创作的文艺作品，一般都能摒弃政治上错误的东西，自觉地以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依据。

我们说长征时期红军的文艺创作和宣传工作与军事、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是就其总体倾向和主旨而言的。但有一部分文艺创作，它们虽然也服从和服务于宣传、鼓动群众的宗旨，但更多的是创作者主体思想的自然流露。如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所作的诗词，谢觉哉等革命老人的诗歌，陈伯钧的长征日记，黄镇的长征漫画等等。这些文艺创作大多感时、咏物、抒怀。长征路途虽然艰苦而漫长，但在征途中大自然以其瑰丽多姿使诗人、作家、艺术家大开眼界，激发了他们积蕴的创作激情和灵感。如毛泽东在创作《忆秦娥·娄山关》时，把激战之后的娄山景象形容为“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据他后来说，这两句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突然遇合而灵感顿生造就的。诸如此类的文艺创作，正如黄镇所说，是“生活的纪实，是情感的表

达,从来未曾想过辑集出版”。^① 我们很难把这类创作归入那些出于直接宣传目的的文艺作品。当然,这些文艺作品在本质上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利益一致,也归根结底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对广大红军指战员起着宣传、教育的作用,这是由创作者的思想倾向所决定的。

长征时期红军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工作的第三个特点是,内容乐观进取,基调高昂激越,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众所周知,红军在长征途中历经磨难。红军内有“左”倾错误军事领导和张国焘分裂主义所造成的危害,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沿途又遇到许多自然险阻,如雪山之高寒,草地之泥泞,腊子口之险峻,栈道之难行,还要经过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困难都是红军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但令人惊奇的是,我们很难从现存的长征文艺史料中找到基调低沉、情绪悲观的作品。相反,大量摆在我面前的,是反映红军如何克服困难,格调高昂激越、乐观进取的作品。比如有这样一首歌谣,前一部分描绘了草地自然环境的恶劣:“川康青边大草原,千里茫茫无人烟。风霜雨雪日夜下,沼泽泥泞漫无边,天上没有鸟儿过,地上不见虫儿现。”接着,作者笔锋一转,情绪从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摆脱出来,“红军今天由此过,山水草木一片欢!”从而使整首歌谣的格调得到升华。再如有一首山歌,反映红军过草地时煮牛皮鞋底充饥的情景。这首山歌没有渲染行军的艰苦,而是着力描绘了红军如何以苦为乐的情怀:“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这首山歌活泼、清新、开朗,没有丝毫悲观沮丧情绪,反映了红军指战员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和团结友爱的革命品质。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这些乐观向上的文艺作品，自觉地张扬了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例如有一首打油诗这样描写红二、六军团抢渡乌江的情景：“远看像根索，近看鸭池河，敌人拼命堵，老子硬要过。要过要过这就过，李觉送行蛮不错。任你对岸站岗哨，我在这边洗洗脚。”要过河，那就不管你敌人堵不堵，“老子”（表示对敌人的蔑视）就是“硬要过”，英雄就英雄到“要过要过这就过”，乐观就乐观到“任你对岸站岗哨，我在这边洗洗脚”，充分反映了红军指战员英勇顽强、一往无前的精神风貌。

在长征期间，因处于异常激烈紧张的战斗环境，红军指战员们喜爱格调高昂、鼓舞士气的文艺作品，不喜欢缠绵悱恻、情调感伤的作品。文艺战士陈靖回忆，在黔东一次战斗间隙，部队举行联欢会。他刚参军不久，唱了一首家乡的山歌：“走了一山又一山，抬头看见火烧山。火烧芭茅心不死，半路丢妹心不甘。”唱完后，排长立即批评他不该“姐呀妹呀”地唱，并帮他把山歌作了如下修改：“走了一山又一山，肚皮走扁腿走酸。刀山火海难不倒，不见红军心不甘。”陈靖照词唱了一遍，顿时赢得了满堂喝彩。这个例子说明，广大红军指战员喜欢乐观向上、活泼开朗的文艺作品，对于情绪低迷、格调不高的作品是自觉加以抵制和摒弃的。

长征时期红军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活动的第四个特点是，文艺形式的大众化。

文艺形式的大众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艺术种类的大众化。众所周知，广义的艺术包括文学（其中包括小说、诗词、散文等），音乐，美术，舞蹈，戏剧，雕塑等多种形式，但在长征期间，就文艺而言，以小说、散文等形式出现的文艺创作活动较少，广大指战员大多喜爱用歌谣、快板、打油诗、活报剧等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配合当时的实际斗争。这是因为小说、散文等文学形式不仅在形式和结构上较为复杂，需要较高的文学素养，创作所需要的时间较长，而歌谣、快板、打油诗等在形式

和结构上简单明了,所需时间短,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喜闻乐见。其他艺术形式也是如此,红军指战员对民歌(音乐)、漫画(美术)、地方戏曲(戏剧)、舞蹈等大众化的艺术形式的选择,都充分反映了长征时期红军文艺创作和演出活动对大众化形式的重视。

2. 当时红军文艺活动对地方色彩很浓的民歌和戏曲等情有独钟,并出现了“旧瓶装新酒”的现象。长征时期文艺生活的地方色彩非常浓厚。各红军部队长征前主要在赣南、闽西、鄂豫皖、川陕、湘西等根据地,大部分红军战士都是各根据地本地人。这样,在长征时期红军的文艺创作和演出活动受到根据地当地的文化风情、地方戏曲、民谣山歌等的影响,同时各部队在长征时所经过地区的文化风情对于红军的文艺生活也有影响。比如,红一方面军中比较流行的曲调是江西民歌和兴国山歌,红二方面军中比较流行的曲调是花鼓调、三棒鼓、站花墙、《绣荷包》、《斗八仙》、《孟姜女》、《闹五更》等,红四方面军中盛行鄂豫皖地区的戏曲、民歌、四川高腔、川剧等,红二十五军里则流行湖北汉剧、楚剧、陕西的秦腔、碗碗腔、河南豫剧等。在舞蹈方面,红军文艺工作者大多借鉴了民间舞蹈《秧歌》、《花灯》、《龙灯》、《打连厢》等艺术形式,创作出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风格、地方色彩的红色舞蹈。这些地方性的民歌、戏曲、舞蹈,广大红军指战员从小耳濡目染,非常喜爱和熟悉,红军文艺工作者在进行演出和宣传时,经常套用这些民歌、戏曲的曲调和舞蹈形式,配以革命性的内容,这样就出现了这一时期比较独特的“旧瓶装新酒”的文艺现象。

3. 形式的大众化还体现在文艺语言上。无论是戏剧、快板、民谣还是诗歌,多以群众的口语为基础,追求语言的明白易懂,通俗流畅,使人读或听起来生动活泼,琅琅上口,充分反映广大战士和群众的个性和特点。例如,红军写在贵州茅台门板上的一首歌谣《红军到干人笑》:“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白军到,干人叫,绅粮笑。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

弟兄拖枪跑；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这首革命歌谣，围绕“红军到”这一主题，作者以简朴流畅的贵州方言，以鲜明对比的白描手法，道出了穷人、富人，红军、白军之间的根本对立与本质区别；号召白军弃暗投明，打倒反动派。这首歌谣讲的虽是一篇革命大道理，但读起来却使人一点也不感到枯燥乏味，而是活泼诙谐，生动有趣，而且音调铿锵，近于顺口溜。这，不能不归功于作者娴熟地运用了当地大众化语言的结果。再有一首打油诗，口语化亦非常明显：“大雪山，不算大，最高不过七十八，——算个啥！同志们，比赛吧，看谁最先登上它，——顶呱呱！看白军，已抓瞎，金沙江边学狗爬，——没办法。蒋介石，回去吧，送来的礼物全收下，——多谢啦！”类似这样的歌谣、快板很多，不胜枚举。

红军的文艺创作和宣传对于大众化形式的努力，一方面受到上述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自身文化素养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却归根结底是由党的文艺政策所决定。毛泽东后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指出，党的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这就要求文艺创作和宣传工作的“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① 具体到长征，由于当时广大红军战士和沿途群众的文化程度较低，采用过于复杂、曲折的艺术形式和语言不仅一时不易创作，而且战士和群众也难以接受。为了完成红军文艺工作的启蒙、教育和宣传任务，进行文艺大众化的努力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但是，这种文艺形式和语言的大众化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红军文艺工作中的一些不足。正如瞿秋白在评价鲁迅的杂文时所提出的：“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